

世界教育之窗

日本的篆刻教育

从传承文脉到建构精神

□ 刘维东

众所周知,日本的篆刻与其书道一样,都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下产生的艺术门类,它们既带有汉字艺术的深刻烙印,又逐步形成了自身强烈的民族特色。艺术传播的过程,也是艺术教育的过程。长时间的文化交融影响、发展演变,形成的不仅是一部艺术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艺术交流史、艺术教育史。



日本白土社书法篆刻展在杭州开幕。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这是一枚由我国艺术大师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先生晚年完成的绝世佳作,制成之后,一直在许多收藏家手中流传。日本篆刻界泰斗小林斗盒在上海的一次拍卖会上重金购得这枚名印,后来在印社百年华诞之际捐赠给西泠印社。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2 日本早期篆刻雏形

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学者们开始整理中国唐宋书画名家的款印并出版了《古书画款印》《君台观左右帐记》和《汉历代印谱》等一大批篆刻集,为书画家制印提供了教材范本。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民众对于书画印的综合审美,提升了鉴赏能力和水平。

我国明代由于石材印章的拓展,打破了以往金属印、木质印的局限。文彭、何震开宗立派,文人治印新风兴起,使用者和治印者实现了合一,高雅审美与技术完成了融汇,引发了明清流派的艺术高潮。明末清初,我国一批文人、高僧、篆刻家以遗民身份来到日本避难,代表人物有独立(1596—1672)、心越(1639—1695)等人。他们在日讲经、传授书法篆刻,推广汉印及文何印风,心越携带的《韵府古篆汇选》(清初陈策编辑)经翻刻、传播成为日本新的篆文参考书。他们为日本篆刻培养了第一批文人代表、篆刻教育家,学生馥子如定、细井广泽等人成为日本篆刻兴起的先驱,独立、心越被奉为“日本篆刻界的鼻祖”。

3 战后的日本篆刻传承

篆刻家河井荃庐和很多无辜民众在东京大轰炸中遇难,美国军队携带欧美文化冲击了日本国土,也严重影响了日本的艺术发展。经过短暂的低迷之后,篆刻家们迅速行动,用艺术创作来激励受伤的民众。他们分作两大阵营:一个是以大阪地区为中心的关西派,以表现自我感性为核心,重在创造崭新面貌,被誉为“感觉主义”。代表人物是梅舒适(1914—2008),1948年创立“篆社”,发行《篆美》杂志。他青年时因迷恋中国文化选修了中文专业,并来到中国师从于吴昌硕的大弟子王个簃,学习达八年之久。为了融入中国文化环境,他听从梅兰芳的建议将本名“梅舒适郎”改为了三字,并且沿用终生。一个是以东京地区为中心

的关东派,强调学习中国传统古典,在此基础上谋求创造,被誉为“传统至上主义”。代表人物小林斗盒(1916—2007),1970年创立“谨慎印会”。小林是河井的高足,老师去世后,他又拜同门师兄西川宁(1902—1989)为师,后来还拜另两位文字学家、中国古印学家为师。为了追求学问,可谓不拘常格、转益多师。在日本,老师还长期保留有为学生赐字取号的传统,如小林就获得了河井老师赠送的“中卿”、号“斗盒”。赠送名号,既是对学生的肯定和激励,也是对老师学问的考验,因此注重传统并不仅限于篆刻技法本身,还要在文字学、汉籍经典文化等方面下大功夫。作为文化的承传、教育的影响,这样充满人文关怀的环节,无疑引导了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重视师承也是日本篆刻教育的一个特点,如梅舒适的师承之一是河西笛洲,师祖是篠田芥津,而小林斗盒的师爷也是篠田,他们都是篠田的嫡传,而篠田正是当年革新派的代表。因此,尽管战后的日本篆刻表面上存在着分野,但在精神层面上,革新是大家共同面对的主题,重塑民族精神是整个日本必须完成的愿景。这一时期的日本篆刻在风格上呈现出刚猛利落、阳刚壮美的审美风尚,强调沉着痛快的刀法和强烈的印面对比,既有继承清末碑派遗风的一面,又有不断突破、开拓新风的鲜明性格。在民族精神的内在特质与艺术载体的外在表现之间实现了贯通与同一,这再次印证了日本善于学习接受、善于融汇转化的民族特色。

4 当今社会教育格局中的篆刻

时至今日,日本在很多场合、生活环节中无论单位还是个人都需要印章完成,签名无法替代其重要性。这些既很好地保留了印章的实用性,同时为篆刻技艺的延续提供了生存空间,社会教育也确保了篆刻艺术的发展。

日本正式开办大学书道教育是1949年。迄今为止,日本开设书道教育课程的大学有二百所之多,其主要目标是培养书法师资,或为师资提供养成教育,书家的培养不占主导地位。对于篆刻教育的课程设置,日本在大学专门科的全日制教学中也是有区别的。如福冈教育大学就设有书法专业本科、硕士,该校本科中对于培养中师学校书法教师的“中师班”,其总的技法训练课程为十七个单元,培养书法家的“书美班”其技法课程为二十二个单元,篆刻课程都是一个单元;而在目标为培养国语课书写教师的本科,以及所有方向的书法硕士中都没有设置明确的篆刻课程。

日本篆刻家协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师资的素养,满足中小学艺术鉴赏课程中少量篆刻内容的授课需要。大量更重要的技法训练与培养主要依靠于社会层面的印社团体,或者篆刻课程老师领衔的外围活动。日本目前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规模不等的印社,成员少则一二十人,多则几十上百。全日本篆刻联盟现有成员300余人,日本篆刻家协会则拥有会员1500余人,他们重视普及工作和会员间的交流,并不断推进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互动,西泠印社现有日本名誉理事、社员20余名,他们都是日本篆刻界的名家。今天,已经是文化资源共享的时代,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也保证了文化交流的畅通与互惠。日本对于篆刻资源的积累除了历史厚度、实物收藏与中国悬殊外,再有就有一定的审美差异。小林斗盒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精心刻

好一枚印章准备参加日展(日本最高级别的展览会),中国篆刻家钱瘦铁认为还不够精彩,而西川宁却十分欣赏,结果赢得第二名。从中国审美角度来看,日本当代的篆刻在风格上类型化、雷同化现象比较严重,其主要问题在于学生将主要精力花在了学习、模仿老师印风的实践中,少有突破明清余绪的文化追溯,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篆刻在更深层面上的突破。日本的当代篆刻更多侧重于展览观感,印面体量也越来越大,很多作品已无法为画家所用,其独立性十分彰显。这也是在世界艺术综合影响之下的结果,即便承载传统文化的艺术类型也无法避免。篆刻虽然在日本艺术门类中似乎属于小众的一种,其实不尽然,由于它与文字天然密切的关系,尤其印信与生俱来的信守品质,使得民众钟情于篆刻的热诚不减,每人拥有一枚自己的印章并非奢望,正如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每家成人都有自己的印章一样。

尽管篆刻艺术与实用印章已经出现了一定分野,但在宏观层面上都承载着同样的功能。由于日本社会对文字的尊重和对手工艺的崇尚,都使得篆刻和书道一样承担着民众的美育功能。如今,电脑刻章对于日本篆刻构成了极大冲击,但基于篆刻、书道、美术、工艺基础上衍生而来的“日本现代刻字”,恰恰又发展成为一门新的独立的艺术形式。因此必须承认,任何艺术只有“飞入寻常百姓家”,才能更大幅度地激发它的活力。日本篆刻已基本完成了自身的当代转型,实现了与民族精神的高度融合,成为与日本书道同样重要的文化景观。作为曾经的外来文化,日本篆刻所经历的接受与转化、承传与创新,以及内在的教育影响模式,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作者系山西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



在学习篆刻

在杭州印学博物馆

三十八位来自日本的书法爱好者

光明图片

视觉中国

在日本,学校以外的教育统称为社会教育,类似于欧美的成人教育、公众教育、通俗教育,或是我国的社区教育等。社会教育是日本全国的都道府县、市町村等自治机构提供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的学习机会,一般是以免费或是缴纳很少费用的形式,由博物馆、公民馆、文化馆、体育馆或是大学等公共机关通过组织开展学习班、讲座、讨论会、参观展览等向民众普及文化或是社会知识。最初是政府给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实行的一种教育补充,发展到今天更像是民众自主学习组织的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

邢雪艳

日本近代的社会教育始于明治维新。当时日本政府出于快速提高国民素质,赶超欧美国家的迫切需要,在学校教育实施的“学制”的同时,也开始着手设置图书馆、博物馆等社会教育设施,以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开阔视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1870—1880年代日本全国上下兴起了开办图书馆和博物馆的高潮。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设立为一般国民提供了良好的获取知识的场所。而在明治政府推动的文明开化的大潮中,各种出版活动和读书活动的空前兴盛,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就成为了文明开化的活动中心,在民众启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明治十年(1877年)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兴起了组办各种“民权学习社”的高潮,这些学习社以青年为中心,开展演说、讨论、宣传西洋新知识,有效促进了民众思想的解放和开化。这就是日本近代社会教育的萌芽。遗憾的是战争期间社会教育也沦为传播军国主义思想的工具而逐渐偏离原来的轨道。

二战后,日本政府通过《社会教育法》(1949年)、《图书馆法》(1950年)及《博物馆法》(1951年)统称“社会教育三法”,使明治以来的社会教育首次获得了法律依据。社会教育逐渐发挥其应有的社会职能。特别是随着社会教育设施“公民馆”的出现,推动社会教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公民馆是兼有社会教育、社会娱乐、振兴镇村自治、振兴产业、培养青年等各种职能的中心机关和综合性文化设施。它的建立和管理完全依靠居民自治,通过民主讨论制定管理条约并选出公民馆的管理人员。日本各个都道府县的市町村都有本区域内的公民馆,其数量与社区机关的数量相当。居民随时方便地在身边找到公民馆并开展活动。其活动有针对性地对年轻父母进行的幼儿教育;有为社区内的青少年提供业余的业外生活和文明生活的青少年教育;有为社区内的所有家庭主妇提供家政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机会的妇女教育;还有为满足老年人充实精神生活的需求与愿望所提供的各种社区活动与继续学习机会的老年人教育。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公民馆逐渐成为人们开展互助交流合作、闲暇时间休闲娱乐、传统文化学习与传承的重要场所。很多传统文化通过公民馆里居民的学习、交流得以传承和保护。当地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在公民馆里举办各种传统文化的传授活动,把自己手里的传统技艺以免费或是很低报酬的方式传播给当地的家庭主妇或是年轻人。在公民馆里经常可以看到当地居民聚在一起学习传统的插花、茶道、民族歌舞等传统技艺,也会有书法、篆刻、水墨画的爱好者聚在一起学习、探讨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公民馆也会根据当地居民的要求,聘请社会上的专家和学者来公民馆举办各种讲座、指导会等文化活动,以提高居民的欣赏水平和专业素质。这些活动既丰富了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提高了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传统技艺的兴趣,对传统文化的推广和传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公民馆里的学习和交流让一些传统文化变得不再陌生和遥远的同时,各种场所地点的展览更是增加了民众学习各种技艺的热情。在日本,各种展览随处可见,不只是专业的画廊、文化室和各种文化私塾的展览室,车站通道、商场、咖啡店等都随时可能成为插花、书法等作品的展示平台,让人们在身边、在不经意中体会到文化和艺术的魅力。博物馆的各种高层次的展览更是人们的精神大餐。因为平时的接触和学习,人们综合素质的欣赏水平得到提高,博物馆的高层次展览变得不再高冷,总是会因人们的期待而出现门庭若市,一些来自于国外的限时展览还会出现排长队购票,甚至是一票难求的景象。

可以说,日本社会教育的发展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不仅提高了民众的综合素质,推动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起到了很好的助力作用。很多发源于中国的像书法、水墨画、篆刻等传统文化,在异国的日本绽放出璀璨的花朵。(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日语系副教授)